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八一南昌起义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B227.1.13

97
K263.1
3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八一南昌起义

郑 明 编著

目 录

一、起义爆发前的国内形势	(1)
(一)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1)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	(3)
二、南昌起义	(10)
(一)革命力量集结南昌	(10)
(二)八一枪声	(16)
(三)起义胜利后采取的革命措施	(19)
三、南征广东	(23)
(一)从南昌到瑞金	(23)

C

368005

(二)会昌战斗	(27)
(三)挺进潮、汕	(30)
(四)激战汤坑与潮、汕失守	(34)
(五)三河坝苦战与井冈山会师	(38)
四、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及其伟大意义	(43)
(一)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	(43)
(二)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	(44)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一场军事暴动爆发于这座历史名城,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八一”南昌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后来失败了,但是,第一支人民的军队却由此宣告诞生。

一、起义爆发前的国内形势

(一)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从辛亥革命,到反对袁世凯称帝,再到反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曾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对反动军阀的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斗争基本上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屡次的挫折和失败后,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依靠军阀去打倒军阀是不可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而就在这时,传来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孙中山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922年9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开始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革命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但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与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并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最后,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等,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一些国民党地方执行机构的领导职务也由共产党人出任。以这两次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建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基础上的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形成了。

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孙中山先生致力 40 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短短的二三年的时间里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广东作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据地,其地位并不巩固,盘踞在广东境内的杨希闵、陈炯明等军阀武装虎视眈眈,随时准备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鉴于这种情况,1925 年 2 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学生军担任主力,进行了第一次东征。经过一年的征战,彻底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了全省。1926 年 7 月 1 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与此同时,广东的工农运动也在蓬勃发展。1926 年 5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共产党人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敢的先锋军。农民是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真正同盟军,广东的农民运动开展

的更是有声有色。到1926年6月,全国约90多万的农会会员中,广东省即占了2/3。农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收缴地主武装枪支、惩办土豪劣绅的斗争。广东农民运动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和各省农民运动的先导。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

国民政府成立后,经过东征统一了广东全境,整个广东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这时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北洋军阀封建割据的黑暗统治之下。当时最大的军阀有两支:一支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另一支是代表英帝国主义利益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其中尤以吴佩孚、孙传芳的反动军队对广东国民政府的威胁最大。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嚣张气焰,进而统一全中国,1926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北伐的方针。7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北伐军从广州出发,首先向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佩孚、孙传芳的反动军队发起攻势。一路上,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势如破竹。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仅用半年的时间,便彻底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先后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在北伐中,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在夺取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的关键战斗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及其所在的第四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建立了赫赫的战功，并因此而被誉为“铁军”。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各地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北伐军军威所指，所向披靡。而北伐的军事胜利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1927年1月，汉口、九江两地的人民，在经过顽强的斗争后，收回了当地的英租界；经过两次起义失败的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等的领导下，于3月举行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最终击溃北洋军阀的反动军队，成立了上海革命政府，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暴动的胜利。

面对大好的革命形势，工农大众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以为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统治从此可以结束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出于自身的利益，不能容忍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他们开始走上背叛革命，投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怀抱的道路。

实际上，国共两党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民党内部一直涌动着一股反共、反人民的暗流。

早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国共合作期间，就有人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个“阴谋”，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10月至1926年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居正等14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

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党籍，开除国民党中执委中的共产党人等反革命决议。

在北伐前的 1926 年 3 月，当时还披着“左”派外衣，以坚定的革命者自居的蒋介石利用当时他任国民政府军事总监和黄埔军校校长的地位，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共产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之后，又扣留了第一军中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并强迫他们退出了第一军，5 月 15 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以“消除误会，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为幌子，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并剥夺了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权利。由于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中反动势力的进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立场，使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党政军大权，为其日后实现更大的反革命阴谋创造了条件。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同年 11 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并且决定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分两批北上武汉。在第二批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委员北上途经南昌时，蒋介石突然扣留了他们，并攻击武汉国民政府是非法的，污蔑共产党人在压迫国民党员，狂叫共产党“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制裁的权力”。至此，一直以左派自居的蒋介石逐渐露出了自己的真正面目，开始为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制造舆论。与此同时，他指使歹徒在江西、安徽等地摧残农运，捣毁工会，打击仍在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地方执行机构。1927

年3月6日,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坚;11日解散了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17日在九江攻击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屠杀工农群众;23日又在安庆大开杀戒。蒋介石高举着屠刀,从赣州、南昌、九江、安庆一路杀向上海。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热烈欢迎。大资产阶级表示,为了“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落共产党之手”,希望蒋介石能够“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并且答应为蒋提供数千万元的经费。而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则表示,将通过租界给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一切便利条件,驻扎在上海的3万多外国军队将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人民可能的反抗。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怂恿,使蒋介石受宠若惊,由此更加加快了其反革命的步伐,开始积极策划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活动。

4月2日,国民党右派吴稚晖、张静江等8人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在会上,由吴稚晖提出了一个所谓对共产党破坏两党团结的“弹劾书”,为蒋介石发动政变制造舆论。4月3日至5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古应芬等10余人连续召开反共秘密会议,决定在4月15日前“清党”,同时正式“分共”。蒋介石负责东南——上海方面的屠杀,古应芬到广东去策划反革命政变,而汪精卫则去武汉进行分裂革命的活动。4月8日,蒋介石又授意白崇禧、吴稚晖、陈果夫等人组织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果实。

面对日益嚣张的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却毫无警惕。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企图日趋明显，工人群众多次报告反动派将袭击工人，中外报刊也早已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报道的情况下，陈独秀居然在4月5日与汪精卫一起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在这份“宣言”中，不仅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反而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并要革命群众不要听信谣言，要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陈独秀的所作所为起到了帮助蒋介石解除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掩护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烟幕弹的作用。

4月11日，在蒋介石的直接布置下，二三百名流氓歹徒在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家中集合。12日凌晨，这些冒充工人的流氓打手开始在一些地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准备不足而不敌歹徒打手。尔后，反动军队则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以欺骗和强迫的手段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位于闸北湖州会馆的总工会也被反动派占领。为了反击敌人的这一暴行，4月12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罢工令，要求反动派归还枪支，惩办凶手。愤怒的群众从反动军队的手中夺回了总工会会所。

4月13日，上海的纱厂、电车工人和海员、店员20多万人举行罢工，抗议反革命分子的暴行。下午1时，罢工群众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前往位于宝山路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反动军队突然从各个里弄里冲出，向手无寸

铁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100 多人，伤者无数。当时正值天降大雨，被害工人群众的鲜血和着雨水流淌，染红了整条宝山路。与此同时，在上海其他地区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也遭到了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接着，反动派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一切革命团体。凡是被认为是共产党员或革命者的就会被捉、被杀，甚至被腰斩、凌迟处死。一时间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这次大屠杀中，有五千多名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被害，著名的共产党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就是在此期间牺牲的。

紧随上海“四一二”屠杀之后，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包括肖楚女、熊雄、邓培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被害。

与南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相呼应，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包围并袭击了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机构，逮捕了苏联外交官和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4 月 28 日，张作霖不顾人民群众的抗议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将李大钊等 20 多位革命者秘密处死于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得手后，于 4 月 18 日成立了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反动政权成立后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清党”，并且明令通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著名活动家 190 余人。紧接着，国民党南京中央决定成立“清党委员会”，立即在上海、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开

始“清党”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分立的局面。这其中只武汉国民政府还是代表着人民利益的革命政权。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政府曾表现出了极大的义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通电全国将蒋介石捕获按反革命罪惩治。当时的武汉成为中国革命者和革命运动汇集的中心。但是，由于武汉政府是由与大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汪精卫之流在起主导作用，这就使武汉政权所表现出的革命只能是暂时的。从1927年5月开始，武汉国民政府开始迅速地向“右”转。7月14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大屠杀“分共”计划，15日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公开叛变革命。他们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等所有革命团体，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口号下，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彻底分裂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全国笼罩在一片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中。

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的公开反共表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阶层人民联合的统一战线最终的破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紧密相连的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被革命吓慌了神的民族资产阶级则附和了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为。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被看成了同盟者，而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则被看成了仇敌。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二、南昌起义

（一）革命力量集结南昌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的烈火更是扑不灭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后，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新的斗争方式来解决，中国革命必须以新的斗争形式进行。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掌握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7月中旬，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了不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准备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准备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

由于考虑到我党能够直接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多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而这些部队这时都以东征讨蒋之名随第二方面军向九江、南昌一带行动。因而周恩来主张由叶挺等部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党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和决定了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南昌地处赣江下游，是江西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在九江、南昌一带敌我力量的对比是这样的，我党可以掌

握或影响的部队，能够集中到南昌的大约有3万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团长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叶挺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周士第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南昌铁路沿线的马回岭车站，这两支部队的兵力加起来有近万人；他们的前身就是在广东出发时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无敌，号称“铁军”。它原有队伍的士兵大都是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的产业工人，军官则大都是由黄埔军校训练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而政工人员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北伐战争发展到湖南、湖北后，这两支队伍里又补充进了许多两湖农民协会和工会、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因此是士气最高、纪律最好、最有觉悟的部队，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军事部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

二是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当时这支部队是刚刚从鄂东开到九江的，兵力大约有两万人。贺龙虽然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已表示要坚决跟党走。他为人豪爽、忠诚、可靠，而且共产党人周逸群这时在这支部队任党代表，并收留了从武汉和两湖其它地区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300多人，党的组织基础比较好。

三是共产党人朱德任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德在辛亥革命后曾在云南护国军蔡锷的部队里担任过旅长，因其作战机智勇敢，在滇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驻守在南昌的是滇军朱培德的第三军，因此朱德便奉中央指示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声望和同僚关系创办了军官教育团。当时除已毕业

者外,在校的学员有3个连,约300余人,都是中下级军官。朱德这时还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警察也归他指挥。还有共产党人方志敏开办的南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共有学员600多名。

此外,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还有卢德铭、罗荣桓领导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分校的学员,他们从武汉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因为途中受阻没有赶上。警卫团后来开到江西修水,成为秋收起义的一支力量,武汉军政分校则被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随张发奎到了广州,后来在叶剑英的率领下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而这时,南昌城里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朱培德第五路军的主力第三军和第九军分别驻扎在吉安、进贤一带,而朱培德本人当时正在庐山与张发奎等人一起商讨反共事宜,南昌城里只有朱培德的一个指挥部和6个团,共计1万余人,从力量对比上看,革命武装的力量远超过反革命武装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武汉政府反共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已变得越来越严峻。亲武汉汪精卫政府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等在九江、庐山一带准备集结3个军,阴谋把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调到九江与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消灭之。当时的军事形势十分紧急,可以说是非我歼敌,即敌歼我。乘敌人的阴谋还正在策划之中,从为了保存这仅有的武装力量的角度出发,也必须举行起义。

全国解放后,贺龙在回忆当时的紧急形势时说:“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原定是东征去打蒋介石,许多共产党员以及很多被反革命追捕的两湖各地农

民协会的委员长都跟着我的部队。但是到了九江,情况就变了,说我的部队太好,朱培德要我和叶挺到庐山去开会。当时叶挺住在黄琪翔(四军军长)的司令部(在鄱阳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划子(即小船)上开了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是否考虑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向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

这个在小划子上召开的三人会议对起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叶剑英当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比较早地获悉了张发奎、朱培德企图将叶挺、贺龙诱骗上庐山并加以扣压,然后消灭这支革命武装的阴谋。在这危急关头,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迅速将敌人的阴谋告诉叶、贺二人。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小划子上的磋商和决定是十分及时的。从7月25日开始,叶挺、贺龙的部队开始沿南浔铁路一批批由九江开向南昌。7月27和28日,叶、贺部队先后到达南昌。贺龙的指挥部设在朱培德总部和伪省政府附近的中华圣公会内;叶挺的指挥部则设于百花洲畔的心远大学内。至此,参加起义的主要部队顺利地移到了集合地点,完成了集中任务。

与调动部队完成的同时,起义的其它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7月25日,周恩来在陈赓的伴随下,已经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住进了花园角二号的朱德寓所。接着,恽

代英、彭湃、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和李立三、谭平山等人也相继离开武汉到达南昌。

7月27日，周恩来不顾长途跋涉的艰劳，于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条件下，在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召开了党的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等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的决定，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然后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研究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并做出了相应的战斗部署：贺龙的第二十军负责消灭位于章江路的朱培德总指挥部，伪省政府和牛行车站及永和门附近的敌人；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负责消灭顺化门、贡院、天主堂和新营房一带的敌人并攻占敌军弹药库；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负责监视进贤门和小花园一带的敌人。会议决定，7月30日晚上发动起义。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位于南昌西大街的第二十军指挥部，亲自找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谈话，把起义的计划郑重地通知了他，并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激动而坚定地表示：“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随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之后，又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紧张而有计划的进行着。就在临近起义的关键时刻，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南昌。7月29日，当时在九江的张国焘就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接连两次给起义前敌委员会发电报，说“暴动要慎重”，并提出要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是否举行